

清代粉彩外销瓷纹饰的视觉叙事功能分析

张逸羽 邱夷平*

泉州师范学院 纺织与服装学院, 福建泉州, 362000;

摘要: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外销瓷贸易的繁荣发展,粉彩瓷作为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也成为了外销瓷中的“主力军”。清代是粉彩瓷创烧与兴盛的关键阶段,笔者以清代粉彩外销瓷纹饰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粉彩瓷的历史背景,分析这一历史阶段粉彩外销瓷定制化发展与文化交流的特征,从题材、构图、色彩三个方面解析纹饰的艺术特色。重点阐释了文化叙事中的思想传播与跨文化融合、情感叙事中的宗教共鸣,及社会叙事中的身份认同功能,揭示粉彩瓷纹饰作为全球贸易与文化交流见证的独特价值。在全球化当下,粉彩外销瓷纹饰的跨文化融合路径也为当代跨文化传播与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提供一些启示和参考。

关键词:粉彩瓷;纹饰;海上丝绸之路;视觉叙事;文化传播

DOI: 10. 64216/3080-1516. 25. 09. 031

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贸易通道,在推动商品流通的同时,也成为加速文化交流的关键因素。清康熙年间,粉彩瓷应运而生,而且凭借它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外销瓷中的重要品类。雍正至乾隆时期外销进入鼎盛阶段,通过广州等港口远销欧洲、美洲、东南亚等地^[1]。粉彩外销瓷的价值不仅在于贸易流通,更在于其纹饰承载的文化意义。这些纹饰既延续中国“托物言志”的传统表现手法,凝结了华夏文明的精神特质,又因应海外市场需求融入异域文化元素,形成独特的视觉符号体系。本文聚焦清代粉彩瓷纹饰,梳理其历史背景与艺术特色,深入分析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视觉叙事功能。

1 粉彩外销瓷的历史背景

清代康熙晚期(约公元1680-1722年),粉彩在景德镇创烧,融合了五彩与珐琅彩工艺,以柔和釉色、细腻笔触著称。雍正至乾隆时期,粉彩外销进入鼎盛阶段。这一时期欧洲“中国热”盛行,贵族阶层对东方瓷器的追捧推动需求量的增长。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正式停止海禁,次年开放立闽、粤、江、浙四大海,海外贸易迅速恢复。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封闭闽、江、浙三海关,开启广州一口通商的历史,还形成“景德镇制坯、广州施彩外销”的生产模式^[1]。

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垄断东西方贸易,将大量粉彩瓷运往欧洲。为适应西方市场需求,外销粉彩常采用定制化设计,如绘制欧洲贵族纹章、宗教题材或西洋风景,形成“纹章瓷”“镶铜瓶”等特色品类。嘉庆以后,粉彩外销虽因欧洲本土制瓷业

兴起有所回落,但仍保持规模。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使外销渠道进一步扩大,粉彩瓷开始更多销往美洲、东南亚等地,这些外销瓷通常会融合外销目的地的文化、艺术特色。

粉彩外销不仅是商品贸易,还承载着文化交流功能。中国制瓷技艺通过外销传入欧洲,影响了欧洲瓷厂的发展;同时西方审美也反作用于中国制瓷,形成了独特的跨文化艺术风格。这种地区间文化要素互学互鉴的现象,构成了文化的循环,共同促进了粉彩瓷艺术的发展。

2 粉彩瓷纹饰的艺术特色

2.1 粉彩瓷纹饰的题材分析

粉彩瓷纹样以丰富多元的题材构建起独特的视觉符号体系,其创作延续中国传统文化“托物言志”的象征传统,将华夏文明的精神特质凝结于器物之上,成为承载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从题材类型看,涵盖花鸟、走兽、山水、人物等诸多门类,每类题材的选取都凝聚着手工艺人的技艺精髓与文化智慧。当这些纹饰随瓷器远销海外时,既展现了中国制瓷工艺的高超水准,更以视觉叙事勾勒出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

华夏文化的多元维度在粉彩瓷纹饰中得到充分体现,孕育生命力量的农耕文化、充满烟火气息的市井文化、追求精神超脱的宗教文化、彰显造物智慧的工商文化等核心文化形态^[1],均通过纹饰实现艺术化表达。其中吉祥如意题材最具代表性,通过谐音、象征传递美好向往:蝙蝠纹谐音“福”寓意福气,牡丹纹象征富贵,缠枝莲纹寓意生生不息。

为适应海外市场的需求,清代外销粉彩瓷中还出现了大量中西融合的纹样题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见证。这类纹饰或在中式器型上绘制西洋风景、宗教人物、欧式建筑、西方花卉纹,或将欧洲贵族家族纹章与中国传统花卉纹、缠枝纹相结合,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

2.2 粉彩瓷纹饰的构图方式

粉彩瓷纹饰的构图并非简单的图案堆砌,而是在遵循中国传统美学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器物造型特征形成的系统性空间叙事逻辑。工匠通过巧妙的布局设计,将平面纹样与立体器型有机融合,在有限的器物空间内构建出层次丰富、意义完整的视觉叙事体系,实现了“形”与“意”的统一,粉彩瓷中常见的构图形式有散点式、开光式、满地式、团花式等,介于有限篇幅,笔者例举2种构图类型进行阐述。

散点式构图是中国独特的构图方式之一,它不同于西方焦点透视的空间限制,以中国传统的“移步换景”的思维方式在瓷器表面形成散点透视效果的纹样。这种构图通过多个视觉焦点的并置,在同一画面中展现多时空、多场景的叙事内容。

开光构图是通过“框景”手法强化叙事的主次关系,常见于碗、盘、瓶等器物上。工匠以圆形、方形、菱形等几何“开光”区域作为视觉焦点,将核心纹饰置于其中,周边则以缠枝纹、回纹等辅助纹饰烘托,形成“主次分明”的叙事结构。这种构图既突出了主体纹饰的叙事核心,又通过辅助纹饰的环绕增强了整体装饰性。

2.3 粉彩瓷纹饰的色彩体系

粉彩瓷的色彩运用服务于叙事主题的情感表达,雍正与乾隆时期的风格差异尤为显著。雍正时期粉彩以“软彩”风格著称。粉彩瓷色彩选择紧扣文人雅士的审美追求。此时工匠以玻璃白为核心,基本以五彩颜料为基础色料调和出柔和过渡的色调,在降低了色彩纯度的同时又增加了粉彩填色颜料的种类^[3]。

到乾隆时期,大批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将以华丽精巧、繁复装饰著称的洛可可艺术风格带来了中国,乾隆皇帝也受此影响。乾隆粉彩大量使用金彩,使原本就花团锦簇的瓷器纹饰显得更为雍容华贵、富丽堂皇^[4]。如现藏于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的粉彩描金花卉纹徽章茶叶罐,花卉用金彩勾勒,开光中叶片层次通过深绿与浅绿对比

强化,色彩层次丰富。这种风格精准契合当时欧洲盛行的洛可可风格审美,描金华丽优雅,更凸显出使用者高贵身份。

从雍正的淡雅到乾隆的浓艳,粉彩瓷色彩的变化始终服务于叙事主题的情感需求。色彩的选择与搭配,通过明度、饱和度的精准控制,为纹样叙事奠定了鲜明的情感基调,成为连接器物与观者的重要情感媒介。

3 粉彩外销瓷纹饰的叙事功能分析

3.1 粉彩外销瓷纹饰中的文化叙事

粉彩瓷外销瓷的文化叙事体现在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表达上。例如山水纹样中以“三远”构图传递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意境融入瓷器装饰中。

粉彩瓷外销瓷的文化叙事并非只有单向输出,还呈现出双向融合的特征,形成了“似中非中,似洋非洋”的独特视觉表达。如图1所示的粉彩堆白花鸟瓷盘,是清代乾隆时期的粉彩外销瓷,现收藏于景德镇市新青年湖田瓷社。盘心以细腻粉彩绘山石花鸟,喜鹊、蝴蝶、蜜蜂营造春意灵动,是东方自然美学与抒情传统。盘沿堆白折枝花卉是中式传统瓷器装饰工艺的呈现,椭圆形开光融入欧洲庭院风景与象征寓意纹样,狗、羊、鹰分别代表忠诚、信仰、英勇。该盘以东方工艺适配西方需求,借中国瓷盘载体融入西方文化符号,在贸易互动里实现双向融合,见证海上丝路中西艺术文化共生创新,是跨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



图1 粉彩堆白花鸟瓷盘

粉彩外销瓷中还有一类其纹饰呈现完全异域样式,中式风格的纹饰几乎完全消失。这也侧面反应出西方商人和藏家对于其本民族的文化 and 审美表达需求。如图2所示的粉彩描金人物图徽章盘,它的主题纹样是具有欧美等贵族、显赫家族、公司或团体等身份象征的徽号纹章。盘外围边饰采用了18世纪欧洲颇为流行的繁复华丽的卷草纹样,其线条流畅且富有动感,蜿蜒卷曲间

尽显欧式装饰艺术的浪漫与细腻,围绕盘身形成独特的装饰带,极具异域风情。盘的正中央是金色的徽章纹样,两边站立着的旗手具有鲜明的西方人物特征,绘画技法上与传统中式人物画像相比增添了阴影,营造人物的立体感^[5]。



图2 粉彩描金人物图徽章盘

3.2 粉彩外销瓷纹饰中的情感叙事

粉彩外销瓷的情感叙事是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纹饰符号实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情感共鸣与价值传递。这种情感表达既包含个体情感的寄托,也涵盖群体文化的情感认同,更在器物中凝结着人类共通的美好向往。

以东南亚市场为例,乾隆时期部分粉彩瓷出口东南亚,这些瓷器充分考量当地文化,纹饰多迎合东南亚穆斯林喜好。如18世纪出口的粉彩盘,莲花是伊斯兰教清真言的核心,莲花纹粉彩大盘的出口使器物成为宗教情感的物质载体,将中国制瓷技艺与东南亚宗教文化需求融合。对于东南亚穆斯林而言,这类粉彩瓷不只是普通贸易品,而是承载宗教情感与文化认同的载体。瓷器上契合其信仰的纹饰,能够强化他们对宗教信仰的精神归属感,在宗教仪式、日常供奉等场景中,维系着当地的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展现出粉彩外销瓷在跨文化情感叙事里,构建文化认同、传递宗教情感的重要作用^[6]。

3.3 粉彩外销瓷纹饰中的社会阶级叙事

器物具备承担“社会职能”的潜能。它们能够成为文化归属、财富水平和社会地位等各类身份维度的物质象征。在这种逻辑下,贵族群体可借助瓷器划分并明确社会等级。一方面,那些装饰着家族徽记与专属标识的纹章瓷,将所有者的身份地位如现代的“软广”一般呈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可见可触的器物形式,使抽象的社会地位转化为具体的物质存在,强化了身份的外在辨识度。另一方面,纹章瓷以器物为载体构建起一道

具象的社会界限,成为划分社会地位、区分家族圈层的物质标尺。它不仅可以强化家族内部的身份认同,更通过纹饰的独特性将同级阶层的家族凝聚为隐性社群,以物质符号的形式与其他社会群体形成鲜明区别,最终在器物的流转与使用中,固化出清晰可辨的社会阶层边界。

综上所述,清代粉彩瓷纹饰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视觉叙事,本质上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大循环”。既让华夏文明的精神符号借由瓷器远播海外,又以开放姿态吸纳异域文化元素,形成“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的独特景象。从当代的角度来看,粉彩外销瓷纹饰的叙事经验仍具借鉴价值。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其基于文化尊重的定制化表达、依托物质载体的符号转化,为当代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历史依据;而其承载的多元文化记忆,也为文化遗产的动态传承、传统工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素材,值得在文化研究与实践中不断探索挖掘。

参考文献

- [1] 赵东亮. 中国外销瓷上文化研究[M]. 江西: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21: 64-145.
- [2] 徐杰好, 吕子青. 沿古代“海上陶瓷之路”看清三代景德镇官窑粉彩外销瓷设计的艺术魅力——以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珍藏景德镇官窑粉彩瓷为例[J]. 江苏陶瓷, 2017, 50(01): 12-14.
- [3] 李文跃. 景德镇粉彩瓷[M]. 江西: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9: 2-10+143.
- [4] 林瀚. 斗彩瓷珐琅彩瓷粉彩瓷[M]. 北京: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2011: 73-74.
- [5] 任华东. 中国外销瓷美术在“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中的三副审美面孔[J]. 艺术传播研究, 2024, (04): 78-89.
- [6] 王晰博. 古代中国外销瓷与东南亚陶瓷发展关系研究[D]. 云南大学, 2015.

作者简介: 张逸羽(1999—), 女, 汉族, 湖南岳阳人, 泉州师范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艺术设计。

通讯作者: 邱夷平(1955.07—), 男, 汉族, 上海人, 博士后, 泉州师范学院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为三维纺织结构复合材料、绿色复合材料。